

# 巴黎符号学派对翻译的思考<sup>\*</sup>

王天骄

**摘要:**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颇具价值的方法论, 符号学在翻译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思考翻译问题, 进而有效扩展翻译行为的实践边界, 这不仅是符号学家所要面对的重要论题, 也会给新时期的翻译研究者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巴黎符号学派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敏感性, 他们密切关注符号学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主要梳理他们的重要论述与核心观点, 考察他们在符号学视角下对翻译问题的探索, 以供国内符号学研究和翻译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 对等, 三分法, 符号间性, 符号学矩阵, 翻译程式

## The Paris School of Semiotics on Translation

Wang Tianjiao

**Abstract:** Semiotics, a valuable methodolog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ow to think about translation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emiotics and then effectively expand the practical boundaries of translation behaviour not only furnishe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scholars bu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for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in the new era. The Paris School of semiotics exhibits a strong awareness of and theoretical

---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巴黎符号学学派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应用”(21YJC740028)中期成果。

sensitivity to these challenges, paying close and in-dept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iotics and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s and core viewpoints of the Paris School on this topic and examines its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domestic semiotics researchers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Keywords:** equivalence, trichotomy, intersemioticity, semiotic square, translation programmes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1016

巴黎符号学派是当下法国符号学乃至世界符号学的重要学派，它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标志是1966年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 J. Greimas）出版其代表作《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工作不仅开启了现代符号学针对符号间性和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传统，还带来了法国乃至欧洲符号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从以索绪尔（F. D. Saussure）为代表的系统论符号学（*sémiologie*）转向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叙述论符号学（*sémiotique*）。符号学对翻译的兴趣由来已久，“在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翻译概念一直位于中心地位”（Eco, 2006, p. 17）。符号学家甚至认为翻译是一种纯符号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人们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讲述同一种事物，将同一种信息从一种符号系统转移到另一种符号系统。作为符号学研究的重镇，巴黎符号学派结合自身的研究实际，对翻译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颇具启发性的思考，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于巴黎符号学派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国内学界目前谈论的还不是太多。有鉴于此，下文拟挖掘这方面的资料，探讨巴黎符号学派（或者是与这个学派观点接近）的代表学者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格雷马斯、库尔泰斯（Joseph Courtés）和特洛柯（Rovena Troqe）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 一、雅各布森的工作

备受巴黎符号学派推崇的俄裔美籍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似乎是法国第一个把翻译和符号学联系到一起的现代语言学家，对翻译概念的延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雅各布森曾经是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布拉格语言学派

的重要成员，1938至1963年间，他在各种杂志上用英语、德语及俄语陆续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涉及翻译、语音、音位、诗学、交际乃至人类学等诸多问题。这些文章被拥有比利时和法国双重国籍的语言学家尼古拉斯·鲁威(Nicolas Ruwet)翻译成法文，于1963年结集为《普通语言学论集》(*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由法国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出版，2003年再版。这本书的第四篇文章为《翻译的语言学视角》(“Aspects linguistiques de la traduction”)(Jakobson, 2003, pp. 78-86)，它把翻译当作一种语言学现象来考察。雅各布森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符际翻译”的概念，从而把翻译活动和符号行为联系在一起。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有必要介绍一下《翻译的语言学视角》这篇文章对符号学与翻译之间关系的论述，从而了解雅各布森在这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在文章的开篇，雅各布森(p. 87)就引用了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讲过的一句话：“假如事先没有接触过‘奶酪’实体的话，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奶酪’这个词。”雅各布森据此指出，“奶酪”这个单词可以被视为一个词汇编码，假如我们不了解加诸这个编码上的意义，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奶酪”这个词。反过来，即使某种文化不存在“奶酪”这个概念，但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依然能够理解“奶酪”一词，前提就是他们了解到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发酵之后凝固而成的奶制品。因此，雅各布森认为，单词或词组的意义其实应该属于语言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讲，应该属于符号现象，因为正如上文所讲，这是一个词汇编码(“奶酪”)对应一个物质实体(发酵而成的固体奶制品)。如果借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分法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在上述例子中，能指就是词汇编码，而所指则是物质实体。能指和所指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雅各布森也强调，“缺乏符号的所指是不存在的”(p. 79)。这里所说的“符号”其实指的就是符号的能指部分，如果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话，那么符号的能指部分通常被认为是狭义上的符号。

雅各布森接着就提出一个与翻译相关的重要观点：“无论是对语言学家还是对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来说，意义都可以视为被其他符号翻译的结果。”(p. 79)。在此基础上，雅各布森对翻译行为进行了三分：如果我们将某一个对象转换为同一种自然语言内的其他符号，那么这种转换就被称为“语内翻译”；假如对象被转换为不同自然语言中的其他符号，那么这种转换就被称为“语际翻译”；假如对象被转换为非语言象征系统的符号，那么这种转换就被称为“符际翻译”(pp. 78-86)。雅各布森的研究工作对法国结构主义

以及后来的巴黎符号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三分法中的最后一种，即符际翻译，也可以理解为利用非语言符号系统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因而非语言符号也被纳入翻译过程。他认为翻译就是“符号交互”的同义词：“一个词的意义只有经过其他符号的翻译才能体现出来，所使用的符号可以替代这个词，并且这个词在此符号中可以实现更为完备的发展。”(p. 79)

在对翻译进行三分之后，雅各布森又开始分析翻译过程中的“对等”(équivalence)问题。在他看来，对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符号编码系统之间的完全对等往往难以实现。符号系统不能完全对等意味着“消息”(message)无法完全对等，但不同的消息可以相互转换，从而传递大致相同的“信息”(information)。雅各布森再次用奶酪举例：法文单词“fromage”(奶酪)和俄文单词“syr”(也可以译为奶酪)虽然在词义上有很大重合，但是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因为“fromage”表示“白色的奶酪”，而“syr”则表示“发酵时加入了特殊食材的奶酪”。因此，我们在进行语际翻译的时候，往往更着眼于两种自然语言之间信息的传递，而消息转换只不过是实现信息传递的手段。语际翻译中的消息转换就像间接的转述一样，译者从源语言接收到消息，破译其蕴涵信息，接着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并且用目的语(新的消息)传递出去，这样就完成了翻译过程。可见，翻译意味着两种不同编码系统之间的信息对等，消息层面的完全对等是比较困难的，而信息对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实现。所以，经由符号转换实现信息的对等，这是翻译要面对的主要任务。

最后，雅各布森探讨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métalangue)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象语言指的就是自然语言，比如汉语、英语或法语等，对象语言能够借助某一种具体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事物(客观对象)；元语言是指借助某种语言来描述这种语言本身，“我们能够讲某种语言，意味着我们也能够用这种语言谈论语言自身”(p. 81)。雅各布森认为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的科学研究工作阐明了两大层次——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即“每个词语的实际运用和对于这个词的确切定义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p. 81)。他还认为，在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中，人们的认知体验都可以被复现和分类。这实际上是表明，即便种族或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依然可以拥有相似的认知体验，而这种认知体验就是翻译可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在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过程中不免出现词义空缺或局限，但借助某些迂回的方式，比如借词、仿词、创造新词或词义转移等，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人类的认知功能并不十分依赖语言的语法

系统，因为个体体验和元语言操作处于互补关系之中。通过重新编码或者说翻译的方式，言语活动中的认知层面不仅可以辨识，还可以主动获取由其他代码系统构成的释义。

《翻译的语言学视角》虽然篇幅并不长，但雅各布森却在其中提出了与翻译有关的四大论题：（1）把翻译归于符号问题；（2）对翻译活动进行三分法；（3）探讨意义对等问题；（4）分析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针对这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章，贾洪伟（2016）指出，“雅氏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重译域，为符号转换的译域划分和理论分析提供了参考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翻译研究固守等信息转换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雅各布森所提出的三重译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让翻译研究者在关注“等信息”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转移到“符号转换”之上，而翻译符号学“侧重的是以翻译发生过程的符号转换现象为切入点”，“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问题为对象的符号学新兴分支学科”（王铭玉，2015），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雅氏尚未把对符号转换的研究作为重中之重，但仍然可以说他的思想带有朴素的翻译符号学的特征。

然而，雅氏的思想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他过分强调“等值”这一术语，“其实具有浓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色彩”；其次，他虽然提出了翻译的三译域观点，却“出现了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界限不明、标准不清的学理问题”。（贾洪伟，201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雅氏对于翻译的三分法“标准混杂、错层并列”（转引自贾洪伟，2016），也就是认为雅氏所提出的翻译类别之间存在相互重叠的地方。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雅各布森虽然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思考，但他的这种思考是初步的，或者说只是一个构想，具体工作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展开。正如巴黎符号学派资深符号学家安娜·埃诺（Anne Hénault，2012，p. 10）所言：“目前，符号学仅仅是一门科学的构想。”因此应该认识到，雅氏的研究仅仅是把翻译和符号学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远未达到系统构建一门“翻译符号学”学科的程度。

## 二、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的研究

在《结构语义学》一书中，格雷马斯写道：“有关意指过程的第一个观察点在于它无所不在的特征以及它的多样性。当我们对人的境况进行思考时，不禁会发出孩童般的惊叹：从早到晚，从摇篮到坟墓，人类始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意指过程的围攻，无时无刻不被五花八门的信息所缠。某

些文学运动想建立一种排除意指过程的美学，他们的愿望显得多么天真。”(Greimas, 1986, p. 8)。可见，在这本奠定巴黎符号学派理论基础的著作中，格雷马斯所认定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并不是孤立而静止的符号，而是符号的意指过程，即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交互关系，他正是在这种动态符号观的影响下对翻译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库尔泰斯是格雷马斯的追随者，他是格雷马斯的亲密助手与学术合作伙伴，后来成为图卢兹大学的语言符号学教授。他在符号学研究对象以及符号功能等问题上的观点和视角深受格雷马斯的影响，正如他在《话语的符号学分析——从陈述语段到陈述活动》(*Analys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De l'énoncé à l'énonciation*, 1991, p. 36)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对能指/所指关系的忠实性才是，并且将一直都是所有符号学分析的特殊标记”。在1979年和1986年，库尔泰斯与格雷马斯合作主编了《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的第一卷<sup>①</sup>和第二卷，对符号学研究中会遇到的主要概念和术语都进行了详细梳理和阐释，其中有多条词条涉及翻译，下文简要予以介绍。

在词典的第一卷中，两位学者首先从“符号化”(sémiosis)的角度来考察翻译现象。他们指出，符号化过程是“一种操作，这种操作在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之间，或者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一种相辅相成关系的同时，也生成了一些符号”(Greimas & Courtés, 1993, p. 339)。这个定义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符号化过程是建立意指过程的操作，因为意指过程指的就是符号的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之间，或者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其次，符号化过程也是符号生成的过程。符号化过程和编码活动(encodage)、解码活动(décodage)息息相关，根据词典里的定义，编码活动是指“可构筑一种信息”的操作过程，而解码活动是指“辨认构成信息象征要素”的操作过程(p. 83)。可以看出，无论是编码活动还是解码活动，都在代码和信息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为前提的蕴涵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编码、解码都是符号化过程。如果对符号化、编码和解码这三个概念继续展开思考的话，那么首先构思、撰写文本的过程也是一种符号化过程，因为构思和撰写文本所需要的素材就是语言符号，而构思和撰写文本的最终目的是展示文本的意义，这就在符号和意义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化的联系。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既是理解文本的过程，也是再构思、再撰写文本的过程。理解文本即从事

---

<sup>①</sup> 该词典第一卷于1993年再版，本文参考的正是此版本。该书国内已有怀宇先生的译本。

某种解码活动，而再构思、再撰写文本则是编码活动，因此翻译同时具有解码和再编码的双重特征，可以被视为“双向符号化活动”（bisémiosis）。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p. 398）就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现象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正是作为符号学活动，翻译才可被分解为对起步文本的一种解释作为和对收尾文本的一种生产作为。区别这两个阶段可以使我们明白，对起步文本的解释是如何构建可阐释这种文本的一种元语言活动的，或者如何生产与这种文本或多或少相当的收尾文本的。

起步文本是源语言文本，收尾文本自然就是目的语文本。翻译行为被划分为前后两种符号化过程，即解释作为和生产作为，前者相当于翻译行为中对原文进行理解的阶段，而后者则相当于用目的语对原文进行表达的阶段。正是基于翻译活动的符号化特征，在分析翻译概念时，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认为，翻译是位于“有意义和谈论意义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p. 398），谈论意义不仅是生产意指过程的行为，也是一种翻译行为。

在对翻译进行充分考察时，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斯（p. 398）主张摒弃自然语言系统的优越性，从而仅仅将其考虑为普通的符号系统中的其中一个类型：

相对于其他符号系统，一般会在自然语言系统中觉察到一种优越地位，因为只有自然语言系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充当其他符号系统的目标语言，反之则可能性少之又少。……在自然语言中，自然世界以及根据自然世界来构建的符号系统（如绘画、音乐等）可以得到翻译。

上文更加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语言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系统（即根据自然世界来构建的符号系统）和翻译三者之间业已形成的符号化特征。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可以得到翻译，也就是二者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逻辑性联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生成了一定量的语言符号。

格雷马斯、库尔泰斯对文本、符号和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可以被视为陈述活动之结果，“文本”可以用“陈述语段”（énoncé）来代替，即文本就是一种陈述语段。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提出了“陈述语段在对等前提下相互过渡”（p. 398）的假设。从另一角度来看，每一个文本都是被设计好的符号系统，其中的构形成分可以被应用于话语或文体实践，此时意义转换也会发生。不管话语或文体实践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都会预设出某种行为者结构。对此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指出，“可译

性是作为符号系统的基本特质之一而出现的,它甚至还是语义表达的基础”(p. 398)。两位符号学家认为,“在存在性判断(即意义是存在的)和言说可能性判断(即能够表达出这种意义)之间,翻译插了进去”(p. 398)。因此,文本意义问题和翻译问题是难以分割的,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文本意义的表达问题。

在《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的第二卷,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从逻辑语义角度,也就是从内在性原则的角度对“符号间性”(intersémioticit )概念进行了分析。符号间性就是单个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符号系统与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可以把它看作“意指过程”这一概念的扩展。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认为,符号间性概念的构建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就是宏观符号学被划分为两大类:“自然世界符号学”(s miotique du monde naturel)和“自然语言符号学”(s miotique de la langue naturelle)。两位学者(1986, p. 119)指出,“符号学家并不认为由自然语言构成的话语是对现实的反映,只有借助于自然世界符号学,话语才对作为参照物的语言之外的现实负责”。换言之,话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周围的自然世界转换为意指过程世界,作为参考系的外部世界被提前符号化。由此可见,构成事实的自然世界符号系统与构成话语的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维系着紧密的意指关系,而这种关系便是符号间性的根本源泉。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谈论符号的“像似性”(iconicit )的时候,坚持认为跨符号事实(即符号间性)旨在“把像似符号作为单词收录进某一自然语言”(1993, p. 177)。跨符号转换活动既丰富又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无论是说明文、记叙文,还是议论文或描写性文字,对它们的译介都不是简单的语词转换,而要涉及更为广泛的非语言符号转换的多种要素。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指出,“对符号组织原则的探寻和对它们词汇化过程的探寻混合在一起”(p. 177),以油画为例,“对一幅油画的分析最终会转换为对描述这幅油画的话语的分析”(p. 177)。可见,以非语言符号转换为特征的符际翻译和以语词转换为特征的语际翻译之间并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而是分别指向上述两种类型的宏观符号系统:自然世界符号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

### 三、罗维娜·特洛柯的研究

罗维娜·特洛柯(Rovena Troqe)是法国利摩日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自从1992年格雷马斯去世之后,利摩日大学符号学研究中



心 (CeReS) 逐渐成为巴黎符号学派研究的理论重镇之一,它是法国首个冠名“符号学”的大型科研机构,其前身是1993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成立的符号学研究小组。2000年,为了对全法的符号学研究进行重组和整合,这个研究小组扩展为今天的符号学研究中心,设立于法国利摩日大学。特洛柯在这里专注于符号学与翻译的交叉研究。她从模态和符号学矩阵的视角来考察翻译过程中“对等”(équivalence)<sup>①</sup>与“差异”(différence)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她创造性地归纳出翻译的符号学程式。特洛柯对翻译的一系列思考可以算是巴黎符号学派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就对她的研究予以具体介绍。

特洛柯首先指出,从根本上说,“翻译”这个概念源自“对等”概念。她认为,无论是从语言学、形式美学,还是从语义学、语用学的角度来说,对等都构成了翻译状态和翻译作为的前提及结果。特洛柯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翻译理论中,“对等”拥有其对立面——“差异”,且二者是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在此基础上,特洛柯把“对等”和“差异”这组对立统一的概念纳入格雷马斯创立的符号学矩阵(carré sémiotique)之中,因为在符号学矩阵中,所有的价值要素都是通过自身的对立面得以确定的:从这个视角出发,“对等”和“差异”就构成了语义类型最小的且对立的值要素,这个语义类型被定义为“自我”(moi),即翻译的认同空间。

因此,翻译就可以被认为是“从他者向自我的转化”。特洛柯把“对等”“差异”这对概念与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述真模态”(modalités véridictives)(Bertrand, 2000, p. 151)联系在一起,她认为在翻译活动中,“对等”“差异”这两个概念受到符号学述真模态的影响,因此她主张借助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对翻译的逻辑符号条件进行分析。在格雷马斯符号学中,“述真”意思是对事物的真实性状况进行描述,它包含“存在”(être)和“显现”(paraître)两大维度,根据二者的组合情况,可以对事物的状态进行判定。“存在”的矛盾项是“不存在”(non-être),“显现”的矛盾项是“不显现”(non-paraître)。“存在”和“不存在”、“显现”和“不显现”这四大要素构成了下面的符号学矩阵(D'Entrevignes, 1979, p. 43):

---

① 特洛柯所说的“对等”一词,法文仍旧是équivalence,和雅各布森所用的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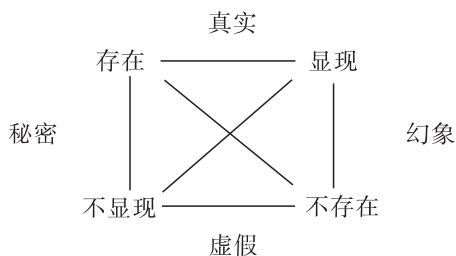


图1 述真模态的符号学矩阵

上述符号学矩阵反映的正是事物的述真模态：假如某种事物既存在，又可以显现在人们面前的话，那么这种事物一定是真实的；假如某种事物既不存在，也不显现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虚假的；假如事物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没有显现在人们面前，那么这种事物就处于秘密状态；假如事物原本不存在，却能够在人们面前显现出来，那么它一定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仅仅是一个幻象（illusion）。可以看出，述真模态本质上就是人们对事物真实性的一种判断。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把“对等”和“差异”这对概念纳入符号学矩阵，从而借助述真模态进一步考察翻译活动的实践特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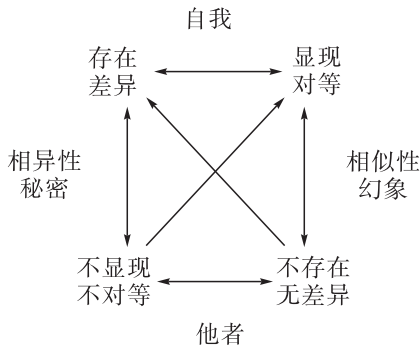


图2 翻译的符号学矩阵

如图2所示，在翻译的符号学矩阵中，“自我”这一项目指的是某种身份、主体、对象或事件的出现。“自我”拥有自身的对立面“非我”（non-moi），也就是“他者”（l'autre）。特洛柯就此提出，“翻译身份的构建正是翻译概念的内在条件”。她认为，“自我”代表译者的文化、语言和个体身份，而“自我”的对立面“非我”（或“他者”）则代表源文本和原作者的另一种文化身份，这种异质文化身份围绕着源文本，成为源文本的外部空间。（Trope, 2015, pp. 20-36）

在翻译的符号学矩阵之中，“差异”指涉的是一种作为参照物的必要价值，这种价值使唯一的自主身份得以出现。在翻译活动中，相对于源文本与原作者来说，“自我”首先表现为一种异质文化身份，但它同时也是话语实践中的一种实体。“对等”指向一种衍生条件，即异质文化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借助符号学矩阵所能展示的述真模态，特洛柯为我们揭示出翻译活动中的悖论。具体来说，从上面的符号学矩阵中可以看出，“差异”和“存在”处于同一位置，它表示尽管翻译追求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意义与形式的对等，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时，“差异”的矛盾项“无差异”（non-différence）处于“不存在”的位置上，表明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无差异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从述真模态的角度来看，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二者不可能完全对等。然而译者尽量缩小这种“不对等”（non-équivalence），使得它尽量不显现出来（即“不显现”），所造成的结果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固有的“相异性”（altérité）被隐藏起来，也就是处于“秘密”（secret）的状态。最后，尽管“对等”显现在读者面前，但事实上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无差异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根本上说，翻译所追求的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相似性（similarité）只是一种幻象。用特洛柯自己的话来说，“翻译总是显现出对等性，从而制造出相似性的幻象。但翻译同时还是差异性的，它带来的相异性通常是秘密性的”（Trope, 2015），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翻译即背叛”的说法。

除此之外，特洛柯还借助符号学模态分析翻译过程中的行为者互动现象，进而从符号学角度区分“翻译”和“翻译学”这两个重要概念。为此她提出“翻译程式”（programme traductif）的概念，它建立在赞助者（commanditaire）与译者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同时也对翻译批评者的认知作为进行描述。一个完整的翻译程式包括“操纵”（manipulation）、“能力”（compétence）、“实施”（performance）和“验证”（sanction）四大阶段。其中操纵阶段也是赞助者与译者建立契约的阶段，它围绕赞助者的“说服操作”（faire persuatif）展开，所要阐明的不仅有翻译的文化价值和目标，还有它的标准和道德规范。在实施和能力阶段，译者需要把自身的能力（即能够做、懂得做）现实化，也就是要把“使成为”（faire être）和“使懂得”（faire savoir）这两个模态施加到源文本之上，使源文本借助另一种语言而重新生成。最后的验证阶段同样由赞助者来完成，这个阶段具有“确认性特征”（type assertif），赞助者主要考察译者行为的结果与契约的匹配程度。因

□ 符号与传媒 (28)

此我们看到，在翻译程式中，操纵阶段与验证阶段均由赞助者来主导，而能力阶段和实施阶段则属于译者。赞助者和译者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翻译程式

翻译行为者	操纵	能力	实施	验证
赞助者	说服操纵 建立契约			考察匹配程度
译者		能够做 懂得做	使成为 使懂得	

特洛柯据此勾勒出翻译活动中的三类认知行为：首先是赞助者的认知行为，他通过“应该成为”（devoir être）和“应该不成为”（devoir ne pas être）的模态来建立翻译契约，从而形成自我的身份空间；其次是译者的认知行为，译者主要是履行契约，他采纳的模态是“不应该成为”（ne pas devoir être）和“不应该不成为”（ne pas devoir ne pas être），事实上处理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是翻译批评者的认知行为，他对翻译过程及译文文本进行识别，即对其中的某些要素进行确认、承认、拒绝或怀疑等。

特洛柯认为，从翻译的符号学程式角度来说，四阶段既是翻译对象生成的场所，也是翻译伦理和翻译标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场所。从翻译行为者角度来说，赞助者、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要推动者，是身份空间的守护者，也是自我/非我互动关系的思考者，而翻译批评者则是翻译的符号学模式的观察者，他对翻译的操纵阶段和实施阶段进行背景分析。换言之，翻译批评者的认知实质上等同于对（翻译的）符号学模式的相关性进行验证。为此，特洛柯总结道，翻译批评者的认知行为“对翻译符号学矩阵各要素价值的实现进行解释，并且把一个更为具体、更加可以触摸的维度，即文本维度纳入这个模式之中”（Trope, 2015）。特洛柯正是依据赞助者、译者和翻译批评者三者不同的认知行为来区分翻译和翻译学，她认为赞助者和译者的认知行为属于翻译的范畴，而翻译批评者的认知行为则属于翻译学的范畴。

我国翻译符号学的开创者王铭玉教授（2015）曾指出翻译符号学和符号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前者旨在建构以符号转换问题为对象的符号学新兴分支学科，后者旨在以符号学理论阐释翻译现象，属于翻译学的一个附庸研究范畴，处于以符号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验证翻译理论的‘脚注式’研究，还未上升到‘学’的阶段。”结合这段论述，我们就会发现特洛柯虽然从符号学视角对翻译的概念、行为以及主体进行了分析，但她仍

然停留在王铭玉教授所说的“以符号学理论解释翻译现象”的脚注式阶段，特洛柯的研究也并未特别强调“符号转换”的地位，没有明确将翻译活动中的“符号转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她的研究还未能达到翻译符号学的阶段。

## 结 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梳理出巴黎符号学派针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历程。雅各布森首先划分出语内、语际和符际三大翻译类型，接着格雷马斯和库尔泰斯从符号化的角度对符号间性进行了考察，最后特洛柯借助符号模态和符号学矩阵归纳出翻译的符号学程式。由此可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黎符号学派始终关注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巴黎符号学派以话语为中心，借助符号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然而，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也不难看出，巴黎符号学派对翻译的思考在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虽然认识到翻译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符号问题，却尚未打破“借助符号学理论对翻译进行注解”的桎梏，客观上使得符号学成为翻译研究的附庸，影响了符号学乃至翻译符号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其二，虽然认识到符号间性的重要性，却尚未把翻译活动中的符号转换确立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而弱化了巴黎符号学派对翻译进行研究的系统性。

### 引用文献：

- 贾洪伟 (2016).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9, 5, 11-18+159.
- 王铭玉 (2015). 翻译符号学刍议. 中国外语, 3.
- Bertrand, D. (2000). *Précis de sémiotique littéraire*. Paris: Éditions Nathan HER.
- Courtés, J. (1991). *Analyse sémiotique du discours—De l'énoncé à l'énonciation*. Paris: Hachette.
- D'Entrevernes, G. (1979). *Analyse sémiotique des textes*. Lyon: PUL.
- Eco, U. (2006). *Dire presque la même chose. Expériences de traductions*. Paris: Grasset.
- Greimas, A. J. (1986).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Paris: PUF.
- Greimas, A. J. & Courtés, J. (1986).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Tome 2). Paris: Hachette.
- Greimas, A. J. & Courtés, J. (1993).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 符号与传媒 (28)

langage. Paris: Hachette.

Trope, R. (2015). Approche sémiotique à la traduction pour le grand public. *Parallèles*, 27, 1, 20 - 36.

作者简介:

王天骄, 博士,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文学。

**Author:**

Wang Tianjiao, Ph. D., lecturer in the Foreign Studies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and literature.

Email: tristanwang2023@163.com